

第二卷

中國現代教育家傳

陳雲

中國現代教育叢書

四

《中国现代教育名家传》编委会编

中国现代教育名家传

第二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

第二卷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曾 卓

*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330,000 印张：14.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7234·716 定价：（简精）3.25元（精）4.45元

出版说明

一、本书编委会约请专家及部分作家、记者，选择自“五·四”运动至今的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将其业绩撰写成传，汇集出版。选择的标准是：在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本书所记述的内容真实可靠，评价客观公正，很多资料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它系统地介绍了各教育家的教学实践及理论观点，可供现代史学工作者、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亦可供师范学院校师生作课外参考书用。本书在写作上力求生动形象，具有可读性。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得到历史知识，学习教育家们的动人事迹和治学、成才的经验。

二、本书将分辑出版，对港、台教育家除已收录者外，也留有适当名额，并陆续进行汇集。全书各教育家传收入的次序按收稿及编辑完毕的时间先后排列；同一辑中则按各教育家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列。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全体编写人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周谷城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并为本书写了序言。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很多教育界前辈及其亲友，全国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教，谨在此一并致谢。

四、本书中有二十一位教育家的传记，曾经以《科学与人》丛书的名义结集出版，本社此次出版时，已将其内容作了修订和调整，另行分辑，特此附加说明。

五、由于编者理论水平及历史知识有限，且限于其他条件，因此难免有缺点及遗漏之处，敬请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周谷城

自 1919 年起到今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五年，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教育工作者中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的代表，他们的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宝贵财富。搜集他们的事迹，给他们立传，使他们昭著于世，这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看一看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发现，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教育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教育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有好几位是教师；“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重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北京大学、黄埔军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在中国革命中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文化战士都曾从事过教育工作，有些人同时就是杰出的教育家；很多职业革命家是从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批职业革命家成为教育家。中国现代教育史在整个中国现

代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点至今尚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我们对现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非常不够，至今还没有一部权威性的、较系统、叙述较全面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专著。编写中国现代教育家传，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将会在提供线索、搜集资料等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无疑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今天，发展教育事业对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的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解决教育问题列为四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这是十分英明的决策。跟一些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事业还比较落后，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任务，要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进行改革，加速发展。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我国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落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我们的一些教育实践、措施，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依据，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很多失误。可以说，教育科学理论研究的落后，反过来成了造成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理论研究落后不等于没有理论。“五·四”运动至今，我国教育工作者培养了那么多的人才，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和各种建设人才，也培养出了不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这里就有许多的成功经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我们不少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问题是，从整体来看，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

索，比较分散，散见于他们各自的实践、经历之中，缺乏综合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形成有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现在，在选择一批在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理论上有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搜集、整理他们的事迹和教育理论观点，编成他们的传记，这一工作，对于研究、建立我国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计划收入一百位左右教育家的传，分册出版。至于选择标准，本书编者提出如下的意见：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教育工作者，均将考虑收入本书。此外，材料搜集的范围、评价、编写的体例等方面，为条件所限，暂不十分苛求。相信这样作仍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希望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能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

目 录

1	竺可桢	余章瑞
39	吴贻芳	张 竞
65	杨贤江	宋恩荣
89	叶圣陶	商金林
173	徐悲鸿	艾中信
217	杨石先	王文俊
243	刘海粟	古 平
283	朱光潜	商金林
313	潘 菽	庄建民 李令节
337	陶淑范	张朝阳
367	陈岱孙	张友仁
399	严济慈	张 沪
447	马约翰	王维屏

余章瑞

竺可桢



国内外求学时期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生于“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的浙江绍兴府境内东关镇。父亲竺开祥，为人厚道，开过承茂米行和源泰烛坊；母亲顾氏，略识文字，教育子女很用心。竺可桢五岁入敬义小学读书，教师是他的中过秀才的大哥。以后大哥到湖北当师爷去了，竺可桢就在家中上私塾，读古文。1905年，毕业于天华寺中心学校。

那时，戊戌变法遭到失败，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绍兴、余杭一带的革命党人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的革命活动，在镇上时有传闻。绍兴城内周家台门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先是到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以后又东渡日本留学的事，也在一些教师和学生心中激起波澜。少年竺可桢富于进取心，求知欲很强，渴望外出求学。这时竺家境况不如以前，在官府的重捐税下，蜡烛坊倒闭了，新建的竺家台门也抵押出去了。父亲

无力支付儿子的求学费用，幸好一位老师资助了一笔盘缠，竺可桢才到上海，进了澄衷学堂。

竺可桢在澄衷学堂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也经历了最初的争取民主的斗争。1908年，临毕业时，他作为班长，和全班同学一起，为要求撤换一位不称职的教师而罢课。校长勒令全班停学，竺可桢只好转学到复旦公学第四班读书。头一次的民主活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少年竺可桢心里留下了印象。

竺可桢在复旦学了将近一年，1909年又北上唐山路矿学堂学土木工程。一年半中五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当时理工科教师全都是英国人，对学生只叫学号，不叫姓名，竺可桢为此痛感屈辱。1910年夏，他到北京参加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考试。在家乡求学时打下的古文底子和在上海、唐山受到的科学技术教育，使这个身体瘦弱性格坚毅的年轻人榜上有名。8月16日，他与同时考取的赵元任、胡适等十一人，一起在上海码头登上开往美国的远洋轮。

到了华盛顿，竺可桢在留美学生督导处填写入学志愿书时，想起故乡东关镇的农民，想起农业的丰歉对国计民生的重要影响，便毫不犹豫地填了学农的志向。他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斯州大学农学院学了三年。暑假期间，他还到南部农村去考察，给农民当帮工，体验农业劳动的甘苦。1913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

同年秋，竺可桢考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当研究生，选择专业时仍本初衷，选了对农业有极大关系的气象学。当时这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学习期间，他到美国一些地方的气象台实习，搜集第一手的气象数据。他一面学习，一面考虑中国每年的台风、暴雨、季风和旱涝的成因、分布等问题。

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竺可桢和任鸿隽、杨铨、赵元任、胡明复等

人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任《科学》月刊编辑。从1916年开始，他在这个刊物和美国的《每月天气评论》上，发表了最初的一批论文，如《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钱塘江怒潮》、《一九〇〇——一九一一年之中国雨量》、《一九一一年夏中国台风之分布》等。他在1918年发表的《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指出台风眼中温度剧增是由于有下沉气流，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论点。就在这一年，他以关于台风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

秋天，他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愿望，离美回国。

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拓荒者

回国以后，竺可桢谢绝了待遇优厚的海关监督的职务，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地理学、气象学。1919年，他经人介绍，与上海女校毕业生张侠魂女士结婚。1920年，他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任教。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地学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地学通论》。还在学校东边的农场内，创办了气象测候所，先是由学生轮流观测，后聘专人逐日观测。正是由于他在气象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工作，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一成立，他就被推为会长。

1925年，竺可桢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国际百科全书》编译室主任一年。

这年夏天，竺可桢在写字间里翻阅报纸，7月23日《申报》上一则消息引起他的注意。消息说：湖南久旱不雨，省府官员先是恭

迎陶、李两位真人神像入城，供奉在长沙玉泉山庙以祈雨。不成，就向中药店索取虎骨，用长绳系好，沉入深潭，使龙虎相斗，兴云布雨。但还是没下雨，于是又在省公署内设祭坛，请僧道念经作法，并下令禁屠。读到这里，竺可桢叹了口气：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教育和科学！

经过一番沉思，竺可桢提笔写了一篇《论祈雨禁屠与旱灾》，发表在1926年第23卷第13期《东方杂志》上。文章论证了祈雨这一迷信活动的起源，笔锋一转，指向了反动统治：

“且我国号称共和，则上自总统，下迄知事，应对于人民负责。旱潦灾荒，须备患于未形，植森林，兴水利，广设气象台。”“而近代官吏每逢干旱，不理冤狱，不赈鰥寡，不省徭轻赋，不黜退贪邪，而惟兢兢于屠之是禁，不亦数典而忘祖耶？”

文章不仅抨击了当局把祈雨禁屠作为对付干旱的唯一方法，还痛斥了军阀的祸国殃民：

“特今日之军阀，往往为一己之地盘，不惜牺牲数千百无辜之生灵。自我国有历史以来，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如现代者，亦不多觐，然则如欲禁屠以免天谴，亦应自禁军阀之屠戮人民始”。“在平时不讲求以科学之方法，调查雨量，及至旱魃为灾，乃惟知祈雨，禁屠，求木偶，迎龙王。以我国当局之所为，而欲列强之齿我于文明诸邦之列，安可得哉？”

文章提出了禁屠应先禁军阀对人民之屠的论点，尽管这是愤激之词，实际是无法禁也禁不了的，却表现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胆识。

在文章后半部分，竺可桢详细论述了雨的成因，我国各地年

雨量，灾害天气的形成及其预报，各世纪太阳黑子年数与我国旱灾年数，等等，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旱灾之多，在世界上我国当首屈一指。则政府人民，当如何利用科学以为防御之法，研究预知之方，庶几亡羊补牢，惩前或可以毖后。若徒恃禁屠祈雨为救济之策，则旱魃之为灾，将无已时也。”

1926年，竺可桢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地理系教授一年。八年来，他在南北几所著名大学教地理学，为建立中国的地理学做了打基础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认识了教育界的一些人士，了解了教育界的若干具体事务，也取得了不少教学经验。这为他日后领导一所大学，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927年，竺可桢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观象台分为天文研究所与气象研究所，竺可桢任气象研究所主任（所长）。

气象研究所设在南京北极阁。这里早在公元五世纪刘宋时期就建了司天台，元明两代又建为观象台，算得上是我国传统的观测天象的胜地。在竺可桢主持下，新的研究所经过七个月的翻建，于1928年1月竣工。初创时，工作人员只有四人，以后增至六人，有两人还被竺可桢派到菲律宾马尼拉观察台学习台风预报。缺少仪器设备，竺可桢便向英、法、德诸国订购；缺少人才，他便办短期训练班，自己任讲师，共办了四期，培养了一百多名观测人员和气象业务骨干。北极阁因而被称为全国气象人才的“摇篮”。

当时全国只有几条航线上的几个气象站以及农校为学生实习而设的零星的气象站，既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统一的制度，仪器规格紊乱，工作时断时续。而帝国主义掌握下的海关和教会却

在我国设立了四十多个气象站，把观测资料汇总于法国人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逐日绘制天气图，供帝国主义者侵略、掠夺我国之用。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研究所从1929年1月开始按月出版气象月刊，每年出版气象年报，内容包括全国五十四四个测候所的观测记录。1930年开始，绘制了我国自己的第一张天气图，作出每天的天气预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对于我国天气预报的垄断局面。

1933年，竺可桢参加了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中国气流之运行》，这是我国第一篇研究东亚大气环流的著作。

193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文《东亚季风与中国雨量》，这是一篇研究中国季风气候的经典著作。它引用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利用季风航行的资料，探讨了季风成因与我国雨量的关系，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前后

1936年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杭州，痛感国势艰危的浙江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他们联络全市学生，要到南京示威游行。校长郭任远极力压制，召军警包围校园，开除大批学生。学生发表《驱郭宣言》，提出“要学者不要党棍”的口号，实行无限期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在这样一片动乱之中，蒋介石亲自出面，于1936年2月21日，召见竺可桢，要他离宁赴杭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没有立即应承，只表示要与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商议后方能决定。以后蒋介石通过陈布雷，多次催

问。竺可桢考虑到，这时如果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他在征求了蔡院长的意见之后，向当局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允准，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竺可桢认为，“校长之最重要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所以他说：“余之第一要着乃在为浙大觅得在可能范围内最适当之人。”整个三月和四月，他都在为聘请德才学识兼备的教师而奔忙。如：

3月27日，聘物理学家张蔭谋到浙大任教；在征求了生物学家秉志的意见后，聘农业科学家吴福祯（雨公）任浙大农学院院长。

4月4日，聘请生物学家蔡堡教授主持浙大生物系，聘请王季梁教授主持文理学院。

4月8日，了解到浙大数学系堪称国内第一，如陈建功之分析，苏步青之几何，朱叔麟之代数，均极能称职，决定继续聘请这几位先生任教。

4月24日，访农业经济学家梁庆椿，后请他任浙大农经系主任。

五、六月间，几次登门拜访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先生，聘请他到浙大讲学。

经过竺可桢不懈的努力，先后应聘到浙大执教的著名学者专家有：数学家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樊君穆，物理学家胡刚复、王淦昌、张蔭谋、朱正元，化学家王葆仁、王琰、王承基、汤元吉、卢嘉锡，生物学家罗宗洛、贝时璋，蔡堡、张孟闻、谈家桢、江希明，土木工程学家和电机工程学家钱令希、王国松，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谭其骧、任美锷、钱穆，农学家蔡邦华、过

兴先、吴福祯，教育学家费巩、黄翼、俞子夷、丰子愷、郑石君，等等。真可谓群星灿烂，极盛一时。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浙大体育馆与学生和教职员见面，发表就职讲话。他要求学生“一方面为学问而努力，一方面为民族而奋斗”。

5月18日，竺可桢在浙大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到会学生四百余人，教职员五六十人，来宾三十人。竺可桢举右手宣誓，誓词中有“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等语。宣誓毕，监督员蒋梦麟等致辞，竺可桢致答词，引证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两句话，表示他办好浙大的决心。

9月18日，竺可桢在新教学楼与一年级新生谈话，嘱学生注意两点：一、我们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学得一技一能果然要紧，而最主要的实在是养成一个清醒的头脑；二、我们出了大学以后将如何？中国人一般的理想以享福为无上光荣，但照现在看来，享福是一种可耻的事，我们出校以后应该为社会服务。这些话概括了竺可桢对人才的要求，他的教育思想和道德观。

竺可桢第一次对学生的讲话记录，以后由浙大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整理发表，题为《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这是一篇有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教育文献。

在这篇文章中，竺可桢强调要继承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立足当时当地现实，吸收人类积累的知识精华。他说：“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